

关于海瑞和《海瑞罢官》  
問題辯論选編

江西省社联办公室

1966年2月

# 說 明

这里，繼續从人民日报、紅旗雜誌、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匯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中，收集了部分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同意或支持吴晗同志、反对与批評姚文元等同志的文章，印成《关于海瑞和〈海瑞罢官〉問題辯論选編》第三册。

本册收集的主要是关于吴晗同志的歷史观、道德观等方面的文章，供内部討論参考！

1966.2.

## 目 录

- 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馬 岩 ( 1 )
- “当时当地的标准”剖析……………李勇文 刘 琳 ( 14 )
- 颠倒了历史的《海瑞罢官》……………史 军 ( 19 )
- 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武慰莹 ( 25 )
- 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 誰是历史的主人？……………朱靖華 吳小林 ( 35 )
- 李文祐
- 评《海瑞罢官》
- 吴晗同志“继承”了什么？……………陸 实 傅仲炎 ( 42 )
- 评吴晗同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嚴 問 ( 46 )
- 关于道德继承和语言问题……………容肇祖 ( 57 )
- 《海瑞罢官》的艺术表现錯在那里？……………吳蔭循 ( 63 )
- 《海瑞上疏》为誰效劳？……………丁学雷 ( 69 )
- 是革命，还是继承？……………吳 晗 ( 75 )
- 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
- 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清官”和“貪官”……………習中文 ( 81 )
- 《海瑞罢官》沒有积极意义嗎？……………陸 雨 ( 84 )
- 替《海瑞罢官》喊冤……………何正祥 离先瑜 ( 89 )
- 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实事求是的态度那里去了？……………李 凱 ( 97 )
- 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 全面認識历史上的清官……………孔柏森 ( 103 )

## 評吳晗同志的資產階級歷史觀

馬 哈 岩

吳晗同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能夠算作“自我批評”嗎？不能。它是對《海瑞罷官》的辯護。豈止是辯護，而且是反攻。這又一次證明了，吳晗同志是多麼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

《海瑞罷官》這個劇本，不可等閑視之。它喊出了資產階級的心聲。它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反映。

不可低估批判《海瑞罷官》的意義。圍繞着批判《海瑞罷官》展開的這場大辯論，是一場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這場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揭露和批判吳晗同志在史學領域內堅持和宣揚的資產階級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的最根本之點，就是反對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來觀察歷史。吳晗同志對封建社會的描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不貫注着這一點。

今天，形形色色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都在鼓吹抹煞階級矛盾、調和階級鬥爭的謬論。我國歷史學界中持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唱出同樣的調子，絕非偶然。

我們必須在歷史研究中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階級鬥爭學說，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歷史觀。

### 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故意抹煞階級鬥爭，是吳晗同志資產階級歷史觀的核心。他認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時，地主階級是進步的力量，不能批

判；秦皇、汉武、唐宗、康熙、乾隆这样一些“全盛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光明面”，不能批判<sup>①</sup>。他断言：“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是人吃人的时代，应该说历史上曾经有过黑暗时代，也曾经有过光明的时代。”<sup>②</sup>

“人吃人”，这是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揭露。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处于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下，或者被杀戮，或者被折磨，总是逃不脱被“吃”的命运。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便在《狂人日记》中，揭穿了封建制度这种“人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sup>③</sup>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以无畏的勇气，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揭露出封建制度这种“吃人”的本质，这正是他们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承认不承认封建制度是“人吃人”的制度，反对不反对这种制度，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是判别一个人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一个重要标志。自诩从小就对“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的吴晗同志<sup>④</sup>，竟连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反封建精神，都觉得不能容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就不是“人吃人”的制度了吗？就不能批判吗？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任何一种剥削制度在其上升时期的历史的进步作用，而且给了这种作用唯一科学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时期中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论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或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都是以一

① 《学习集》，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〇一、二六七页。

② 《灯下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九一页。

③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十二页。

④ 《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五八页。

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任何一种剥削制度，不论它在没落时期还是上升时期，都存在着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有地主，就有骂地主的农民；有封建，就有反封建的农民。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管吴晗同志对于“一见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等等，就喊打倒”的人<sup>①</sup>，怎样讽刺嘲笑，也改变不了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经济上比较繁荣的时期。可是，就在比较“繁荣”的时期，封建制度的人剥削人、“人吃人”的本质也是不变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繁荣”而消失。恰恰相反，这种“繁荣”，正是建筑在对农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是以这种剥削和压迫为前提的。恩格斯写道：“文明的基础既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那末它的全部发展便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领域里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后退一步。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别个阶级的灾难”<sup>②</sup>。吴晗同志的严重错误就在于，抹煞了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皇帝爱百姓、百姓爱皇帝的光明时代。

谁要指出封建社会中的“上升时期”“繁荣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吴晗同志便大肆责备，说这样就使得“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他说，在许多新编的历史教材中，“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sup>③</sup>原来，在吴晗同志看来，农民起义算不得历史上的光明面，岂止不光明，而且很黑暗；说农民起义如何好，同说一个个皇朝如何坏，完全一样，都是抹煞了光明，宣扬了黑暗。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① 《学习集》，第三〇一页。

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七〇页。

③ 《学习集》，第二六七页。

看来，完全相反，吴晗同志说的“光明面”，恰恰是黑暗面；吴晗同志说的“黑暗面”，恰恰是光明面。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sup>①</sup>他还指出，这种“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的农民起义，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sup>②</sup>。

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光明得很！农民革命势力所到之处，官府的赋税不纳了，劳役不服了，地主阶级所有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才是黑暗的封建社会里透露出的真正的光明。

吴晗同志为了证明封建社会的光明面，不是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是农民同地主的阶级合作，为了替这种阶级调和论制造论据，他一方面极力夸大大地主、大官僚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大讲所谓中小地主同人民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说“好皇帝”“清官”就是代表着中小地主和人民的利益向大地主作斗争的。他说，朱元璋“无情地打击了一部分大地主”，“朱家政权的支柱是广大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在他的官僚机构中，官员的来源主要来自这个阶层”<sup>③</sup>；海瑞“打击了官僚地主，保护中小地主和贫农中农以及市民”<sup>④</sup>。

说来说去，吴晗同志是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

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的，如阶层等级之

①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一九、六一七页。

③ 《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五年版，第一八七页。

④ 《灯下集》，第一九五页。

間、集团派系之間、在朝与在野之間、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間、地方势力相互之間，等等。这种矛盾，有时也会表現得很尖銳，需要动用法庭、監獄、军队来解决。而在这种冲突中，人民也往往大批地成为无辜的牺牲品。那末，究竟应该怎样来認識这种矛盾呢？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归根到底，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爭夺剝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力的自相廝杀。不论这种矛盾尖銳到什么程度，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各集团在反对农民这个问题上总是一致的。怎么能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sup>①</sup>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始終，决不会由于“上升时期”而消失，决不会由于“繁荣时期”而中断。这个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的矛盾，决不会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代替。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决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剝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剝削和压迫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sup>②</sup>承认还是否认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历史观同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吳晗同志笔下，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见了。他或者用经济繁荣的现象来掩盖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或者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来代替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就证实了，他在历史研究領域內奉行的是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頁。

<sup>②</sup>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四九一頁。



一条反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而阶级调和论就是这条路线的神经中樞。

### 封建王朝的政策是不是“超阶级”的政策

为了宣揚阶级调和论，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吳晗同志以及一些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大肆宣揚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明智的“让步政策”，说什么朱元璋“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sup>①</sup>，说什么西汉初年、东汉初年、唐朝初年、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当时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的结果。

这是对阶级斗争历史的歪曲。

历史上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开始建立的时候，如西汉、东汉、唐朝、明朝等，封建统治者面临的都是经济雕敝、政治动荡的局面。地主所有制，遭到了农民革命的严重打击。在地主阶级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地主阶级集团之间混战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已被镇压，但余波未平，还有农民起义军在坚持斗争，或者以隐蔽的形式在积蓄力量待机再起。地主阶级中有些集团，暂时还没有听从新王朝的统一指挥。这种时候，封建统治者总得采取种种措施，扑灭农民起义的余燼，恢复和巩固地主所有制，恢复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他们很明白，如果不这么办，新建立的统治大厦是不稳固的。

吳晗等同志反复渲染的所谓“让步政策”，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是新王朝团结整个地主阶级的政策。所谓“輕徭薄賦”“免租减稅”，实质上是给予各地大大小小地主的优惠。汉末的荀悦曾经说过，汉文帝时，实行减免租稅的政策，是“资富强”，结果是“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sup>②</sup>。朱元璋曾经明令规定，只是官员、退职官员、生员才享

① 《朱元璋传》，第三〇〇頁。

② 見《前汉紀》，卷八。

有减免徭役的权利，而其他人特别是农民则有“趋事执役以奉上”的义务，不在减免之列。<sup>①</sup>推行这些措施，是新王朝取得整个地主阶级信赖和支持的重要原因，由于推行这些措施，地主阶级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力量，新王朝便能依靠他们加强对农民的统一。可见，所谓“让步政策”，其实是封建统治者调节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统一地主阶级力量，共同对付农民的政策。

封建王朝只会对地主阶级施行“仁政”，决不可能对农民施行“仁政”。封建统治阶级决不会因为受到农民革命的打击，就“接受历史教训”，改变自己的阶级本性，变得对农民亲爱温柔，慈悲为怀。相反，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怀着刻骨的仇恨，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剥夺农民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果实。例如，东汉初年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奖赏官吏以杀人多少为标准。明朝初年，农民起义仍然连绵不绝，“官军”对起义农民的逮捕和屠杀，动辄以千万计。这种残酷的阶级报复，是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建立起的一切封建王朝必然采取的措施，从无例外。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报复的历史事实，是那种虚構的“让步政策论”所冲刷不掉的。

不错，新的统治者对农民也实行过招抚逃亡、奖励垦荒之类的措施，但这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玩弄的欺騙手腕罢了。他们要用这种手腕来达到用暴力手段所达不到的目的。在新王朝建立的时候，由于农民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和逃亡，许多地区严重缺乏劳动力，农田荒芜。而没有被剥削的对象，统治阶级是活不下去的，何况那些逃聚山林的农民还是对统治阶级的严重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才采取那一套欺騙政策，用一些小恩小惠，把农民哄来作为供他们剥削的牛马。这些政策，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仁慈或明智，并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寻找到的最适合于当时条件的统治办法。采取这种办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法，对地主阶级是最有利的，既可以把农民束縛在土地上，又可以麻痺农民的革命意志。

每当农民起义的暴风雨过去以后，地主阶级用“恩威并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把农民重新控制和束縛了起来。由于农民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势力，地主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元气，因此，在某些地方，农民遭受的剝削暂时可能较起义前略有不同。但是，任何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剝削，都是它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剝削。正因为如此，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加强，农民遭受的剝削越来越残酷，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便又陷入严重的危机。这时候，农民便又点燃起了起义的烽火。

当地主同农民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地主的时候，当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而农民的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的是反攻倒算，尽快地消灭农民革命势力，尽可能地加重对农民的剝削，决不会实行什么“让步政策”。当地主同农民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地主阶级的时候，当地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的时候，地主阶级有时也会采取一些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某些统治办法作局部的改变，欺騙和麻痺农民，力图削弱和扑灭农民革命斗争。这种策略，是地主阶级整个反革命政策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也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实行这种策略的时候，地主阶级决不会放松对农民的暴力镇压，而是用这种策略来作为对农民的暴力镇压的补充，并为更加残酷地剝削农民、更加凶恶地镇压农民革命势力准备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sup>①</sup>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革命势力，应用的同样是这个原则。吴晗同志却硬说，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不采取这个原则，反而实行仁慈的“让步政

---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一一八二页。

策”。你看，封建统治者这么厚道，农民还要反对它，还要造反，那当然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誅”了！

吳晗同志除了宣揚地主阶级曾经对农民实行过什么“让步政策”之外，还力图证明“好皇帝”“清官”办了很多“好事”，如惩治贪污、抑制豪强、兴修水利，等等，说“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sup>①</sup>。在吳晗同志看来，这些“办了大大的好事”的“好皇帝”“清官”，或者由于出身“贫苦”，或者由于“秉性刚阿”，或者由于“眼光远大”，虽然一方面仍旧是皇帝，是官，但同时却又奇妙地兼职作了“人民的代表”，“一身而二任焉”。总之，“好皇帝”“清官”之所以成为“好皇帝”“清官”，就是因为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办了“好事”。

“惩治贪污”！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有时皇帝也惩治几个贪官，这是因为，那些贪官贪得过多，王朝的收入就会减少，还可能闹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抑制豪强”！皇帝就是最大的豪强。有时皇帝也抑制几个豪强，这是因为，那些豪强的行为，不利于王朝的统治，甚至会动摇皇帝的宝座。

执行王朝意志的“清官”，也反对过贪官豪强的某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地主阶级的一切“不法行为”。实际上，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和“不法行为”之间不会有严格的界线，更不会根本对立的，而是可变的、相对的、相互补充的。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时说过：“我们可以主张使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今后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碍有过分常见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发生。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作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誰也搞不清楚何处算是诚实赚钱的终点，何处算是詐欺

① 《春天集》，第二〇四頁。

取財的起點。”<sup>①</sup>在人剝削人的社會里，哪里是“誠實”剝削的“終點”，哪里是“欺詐”剝削的“起點”，是分不清的；怎樣算是“合法”的剝削權利怎樣算是“不法”的剝削行為，同樣是分不清的。今天的“不法行為”，明天會被當作法律固定下來，成為“法定權利”；今天的“法定權利”，明天也許會在法律條文中被取消，而在實際生活中卻仍然保持着。“豪強”的地主和“不豪強”的地主，“法定權利”和“不法行為”，本身就很難分清。其實，封建社會的“王法”所劃的“合法”和“非法”的界線，主要是為了對付農民，地主剝削農民是“合法”的，農民反抗地主是“非法”的。至於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在怎樣的限度內算是“合法”的，超出了怎樣的限度算是“非法”的，地主階級是不能夠也不願意劃分清楚的。作為統治階級一員的“清官”，又怎麼能去制裁所有的貪官豪強，懲辦所有的“不法行為”呢？所謂“執法如山”的“清官”，懲治幾個貪官豪強，也不過是找幾只替罪羊，來宣揚宣揚“王法”的“公道”、帝王的“英明”而已。

“興修水利”！當然，這對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對於好事也應該分析，水利，歸根到底是勞動人民修的，主要應當歸功於勞動人民，而不應當把功勞都記在“好皇帝”“清官”的帳上。而且，“好皇帝”“清官”興修水利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地主階級的需要，是為了地主階級掠奪更多的地租，是為了王朝征收更多的賦稅。事實上，一切剝削階級，從奴隸主到資產階級，為了剝削得更多，總要採取一些促進生產發展的措施。有人會說，社會生產發展了，勞動人民不是也有好處嗎？生產發展了，勞動人民不一定得到什麼好處，因為剝削階級常常把增加的社会財富全部掠奪了去。有時，勞動人民也可能得到微薄的一份。即使如此，又為什麼要對統治者感恩戴德呢？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應該

① 《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三六頁。

归剝削者享有，如果留点残羹剩饭给劳动人民，就是剝削者办了“大大的好事”！这就是吳晗同志的邏輯。

毫无疑问，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同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实行的不同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是有区别的。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那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生产的政策，和实行那些政策的代表人物，从来也不抹煞其历史功績。但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政策，决不会是为农民謀利益的政策，决不会是“超阶级”的政策，而只能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执行这些政策的帝王官吏，毫无例外，做是地主阶级的阶级代表，他们的行为决不会違背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怎么会有那么一种人，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农民的“救星”呢？

### 史学领域中一場尖銳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指引下，掀起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浪潮，掀起了一个用无产阶级意識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識形态的革命浪潮。历史著作和历史教材，必须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羣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已经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共同要求。原来被一些人当作偶像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遭到了革命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現过某些简单化的缺点，可是整个地来说，史学领域里呈現出一种敢于打破旧傳統，敢于跳出前人窠臼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这种形势的出現，是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誕生，总是要伴随一場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sup>②</sup> 历史学界中革命批判精神的激越昂揚，是这场大喊大叫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宣傳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

<sup>②</sup>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版，第七〇六頁。

性”这个总目标服务的。

对于史学领域内革命精神的大发扬，资产阶级认为糟得很。凭着阶级的本能，资产阶级深知保卫自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阵地的必要，他们就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进行抵制和反击。

为什么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竟会引起资产阶级如此激烈的反对呢？为什么在史学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却是环绕着如何对待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呢？这必须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上来寻求答案。

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它的先进人物对封建的社会、封建的国家、封建的传统曾经作过无情的批判。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有共同的东西，有妥协的基础，因此当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的时候，它需要也能够同封建的意识形态结成同盟。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不过它还有自己的特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抵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常常感到自己可以夸耀、可以迷惑人的东西未免太少了。而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人们却有很深的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时，除了贩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些反动学说以外，还不得不乞灵封建的意识形态。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冲击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挂起“尊孔复古”“东方文化”的招牌，从历史垃圾堆里揀出一些东西，作为反对革命的武器。当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御用文人又一次打出了“尊孔读经”的旗号，颂扬封建道德，攻击马克思主义。

开国以来，资产阶级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时，依然是同封建的意识形态结成联盟。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的活动又发展到

非常囂張的程度。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利用我國所遭到的某些暫時困難，刮起了一陣反對社會主義的黑風。隨着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也尖銳化了。

“合二而一論”、“無差別境界論”、“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等等，一時紛紛出籠，此呼彼應。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吳晗同志著文立說，不許人們批判封建制度，不許人們批判帝王將相，不許人們批判封建道德，不許人們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來研究歷史，以歷史學家的面貌，積極參加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合唱。

不僅如此，吳晗同志還“破門而出”，写出了《海瑞罷官》那樣的劇本。寫這個劇本，果真象他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所說的那樣，是“為古而古”、“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的嗎？

我們同吳晗同志在史學領域內的這場大辯論，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歷史科學障地同其他障地一樣，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盤踞着不走。我們必須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在史學領域內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

（原載《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 “当时当地的标准”剖析

李勇父 刘琳

吴晗同志在他的史学论著中提出过一套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这套标准是吴晗同志多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经验总结，概括起来分为八条或六条，其中第一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这八条或六条中的核心，其他各条不过是这一条的陪襯或装点。吴晗同志在他最近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关于对清官的看法”，他“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只在于他不该说这些“清官”“好官”“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我们认为，号召人们今天去学习这些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好官”固然是“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他“对清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因为这是他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就是他的史学观的具体体现。现在既然吴晗同志申言他“对清官的看法”“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而他笔下的这些“清官”“好官”又是根据他的“标准”评出来的，因此，剖析一下这个“当时当地的标准”，不但对于了解吴晗同志的史学观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同志们剖析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到底是在“批评”谁？“批评”什么？

### 什么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

吴晗同志的所谓“当时当地的标准”，根据他的说法，其含义之一就是：“应根据当时人民的意见，应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乍一看来，吴晗同志好象是主张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当时人民的意见，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没有记载下来。而留下来的只能是少数剥削阶级的看法。因为记载历